

中國文化研究 通讯

Newsletter on Chinese Cultural Study

2019 年第 4 期

总第 12 期

西北大学优秀中国文化遗产与创新基地

主办 中国优秀文化遗产发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优秀文化遗产创新智库

顾问

张岂之 王亚杰

郭立宏 常江

主编

李浩

执行主编

张海青 赵杭

责任编辑

陈战峰 任雅芳

孟飞 刘晓宇

王晨佳 王早娟

刘晓 吴红兵

封面题字

袁行霈

◆工作动态

“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整理工作正式启动 12

陕西榆林古城“古代石碑艺术博物馆”正式开馆 13

中心召开《黄帝祭文集考释》编纂项目工作推进会议 14

中心协办“中国园林与文学”学术研讨会 15

◆专家观点

陈尚君 高阳古原有新篇 17

荣新江 出土文献所见丝绸之路概说 112

◆序跋及评论

李浩 究人冥天之际 121

◆学术平台巡礼

西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简介 131

◆学者风采

语言学专家——赵小刚 134

◆新书推介

《唐诗求是》136

“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整理工作正式启动

2019年9月7日,由西北大学、榆林市榆阳区政协主办,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整理工作正式启动。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馆长齐志先生、项目组首席专家、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李浩教授,以及来自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项目组成员出席了启动仪式。

齐志馆长首先对以李浩教授为首的项目组成员表示衷心感谢,并对近年来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在陕西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与开发方面做出的成绩给予了肯定。随后,齐志馆长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收藏经历及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的整体

情况,并对此次整理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和要求。

李浩教授对齐志先生长期从事陕北地方传统文化保护所做出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自成立伊始就肩负着服务我省地方文化事业的使命,希望通过此次整理工作为陕北石刻艺术博物馆打造一张历史文化名片,不仅让学术界更加重视陕北出土石刻文物的研究,也让更多人了解陕北石刻文化的独特魅力。李浩教授还介绍了此次馆藏墓志整理的成员构成、具体分工、项目进程、体例要求等事项。与会项目组其他成员也都就本次整理工作开展提出了宝贵建议。



陕西榆林古城“古代石碑艺术博物馆”正式开馆

2019年9月28日上午9时,由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建设的榆林古城夫子庙文化旅游街区“三馆一中心”建成开馆,三馆一中心包括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陕北民俗博物馆、陕北红色藏品陈列馆、榆阳区文化艺术中心。苗丰、王建领、高生耀、雷亚雄为“三馆一中心”揭牌,榆林市政协副主席、榆阳区委书记苗丰参加开馆仪式并讲话。

依据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了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更好的推动“榆阳区古代石碑艺术博物馆”的建设工作,建馆前期,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与榆阳区政协就馆藏石碑真伪鉴定、拓片整理、文字校对说明等已开展了深入合作,作为学术顾问全程参与建馆工作。

“古代石碑艺术博物馆”是由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建立,展陈的藏志为陕西靖边碑刻收藏家、西

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齐志先生历经数十年所收集的统万城和关中地区出土的古代碑刻,以墓志为最多。从北魏一直到明代,其中不少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如北周的拓跋慎墓志、隋代的梁脩芝墓志、唐代的李百药墓志、高崇文、高承恭父子墓志等等。还有反映民族关系、丝路交往的吐谷浑成月公主墓志、回纥会宁郡王移建勿墓志;反映书法艺术的《唐故遂州司马常府君墓志》盖铭,李阳冰撰额。特别是双语的《大唐故安优婆姨塔铭》,难得一见,为镇馆之宝。

从这些珍贵的墓志中,我们跨过漫长辽阔的时间和空间,窥见古人的生命历程,触摸到历史真实的温度。我们希望藉整理《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发掘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为隋唐史、丝路史的研究提供新材料、新方法。以昭示中华文明之辉煌,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的“金石不朽”之盛业。



中心召开《黄帝祭文集考释》编纂项目工作推进会议

2019年6月4日,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于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图书馆710会议室召开《黄帝祭文集考释》编纂项目工作推进会议。会议由中心副主任赵杭主持,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西北大学出版社以及中心的多位老师参加会议。

首先,赵杭副主任介绍了《黄帝祭文集考释》编纂工作的相关背景,传达了省上领导对于此项工作的重要指示,同时也指出了此次编纂工作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富于意义的重要任务。随后,参与编纂的诸位老师,分别就编纂体例、资料收集、编写分工、时间安排等多项内容

发表了意见,并展开热烈讨论。最后明确了编写工作方案,并成立了由中心主任李浩教授担任主编、赵杭副主任担任副主编下设编纂工作组的《黄帝祭文集考释》编辑工作委员会,同时组成由孟飞博士担任组长、刘晓博士和郭琳博士担任组长助理以及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文学院、中国思想史研究所教授、副教授、讲师参与的编写工作组,全面负责书稿编撰工作。

最后,赵杭副主任作会议总结,要求大家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进行注释、考辨,同时兼顾文化普及,利用此次《黄帝祭文集考释》编纂机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中心协办“中国园林与文学”学术研讨会

2019年10月26日,“中国园林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科研机构及高校的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园林与文学的学术思想理论与研究路径、园林文学的地位与学科重建、园林文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和现实运用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董群雁在致辞中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进入新时代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化步伐突飞猛进,园林以其特有的功能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现代园林设计理念大多都是在中国优秀的造园艺术及造园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古代造园文化和古典园林文学对现代园林设计理念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我们今天相聚一堂,围绕中国园林与文学展开交流学习,意义非凡。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各位专家学者能够深入交流,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让新观点、新方法,成为推动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教育发展的动力,也进一步把园林文学的研究与古代文学学科的拓展及生态文明建设联系起来,发挥学术研究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重要作用。

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会部副部长杜牧表示,中国园林是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的融传统建筑、文学、书画、雕刻等工艺和艺术的文化表达,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追求,在世界园林史上独树一帜。中

国园林是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是创作文化精品的重要源泉,也是丰富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本次研讨会以“中国园林与文学为主题”,围绕梳理园林文学的学术思想理论与学术建构,从理论、文献、运用三个方面把园林文学的研究与古代文学学科的拓展及生态文明建设联系起来,使学术研究紧扣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国传统园林文化,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希望通过在座的专家学者广泛的思想交流和碰撞,为中国园林文学的传承与发展贡献智慧。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杭表示,中国园林与文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国古典园林蕴含着传统“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美学思想,体现着中国气派、中国精神,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赵杭指出,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的国家发展战略,与此相关,园林与园林文学研究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相信本次学术研讨会一定能够取得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也一定能够引导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把中国古典园林与文学这一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

在谈到中国古典园林与古典文学相互渗透、

相互影响的关系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毅教授强调,在中国古代,“文”除了标志语言文学的成就之外,更是文化制度形态进入很高发展水平时必须具备的一种属性,是一种具有本体意义的文化标志,所以在这个共同源头的推动影响之下,包括文学、园林等在内的各类艺术都竭力使自己更具文华之美,同时借鉴吸收一切相邻艺术领域中的相关成就。中国传统园林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具有经典性,而不只是具有一般观赏意义的艺术,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达到了一种“文思光被”的高度成就。王毅表示,中国古典园林所满足的,远不仅仅是人们安置身家、赏玩景致等等功利和享乐的需求,因为较之这些更为根本的,乃是人们在满足一般生活和愉悦耳目的需要之同时,又不断努力构建起一个“有价值、有光辉”的文化荟集之地,构建起一个能够使人们心智获

得滋养和归宿感的“家园”,这样的构建正是出于我们生命和文化的一种根本需要。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储兆文认为,在中国艺术史上,文学艺术与园林艺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交相辉映。筑圃见文心,园境即诗境,园以文传,文借园名。古典文学对园林设计理念的影响尤其深远。通过文学与园林关联的视角,不仅可以扩大文学艺术研究的视野,建立文学的新学科,还可以为园林学、生态学、建筑学、历史学、文艺美学等研究提供生动鲜活的新材料和新的科研增长点。

本次会议由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社科中心联合主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承办,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协办。



高阳古原有新篇

——《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初读述感

陈尚君

高阳原之名在《水经注》中已经有记载,渭水支流沈水先后流过下杜城和高阳原,然后注入渭水。其地汉设杜陵县,唐属万年县,今属长安县。唐都长安安化门西南行仅十里,即可到高阳原,为隋唐大族韦、杜两族世居之地,更因泉深土厚,为理想的寿穴之所。唐谚“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就包括这块地方。从2001年至200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此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出土了大批隋唐墓志。经过多年整理,这批墓志2016年9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书名《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是关中隋唐考古的重要收获。虽然近三十年间出土隋唐墓志数量极其巨大,但大多属于民间征集或盗墓所出,经公私各家汇辑拓本编录而成,本书则以科学系统考古发掘所得为依据,参与整理者又具有良好的学术背景,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本书由故宫博物院王素先生作序,列举本书在墓志整理方面的独创之举,包括对墓志制作的详尽记录、解题记录墓志出土时地和发掘编号、记录出土时墓志在墓室位置及摆放状态,并附录原状图版,确实难能可贵。尤其是最后一项,更属特例。以往出版一人或一家墓志

之考古报告,多存此例,现在一百多方墓志均循此例,说明考古研究院的学者在发掘之初,即有此构想,并能贯彻始终,对研究唐代不同地位、官阶、身份人员墓葬形制和墓志规范,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本书所收墓志凡107方,另志盖6种,其中隋12方,唐95方,讫于咸通十二年(871)。其中包括一些正史有传人物的墓志,如《北齐书》有传之刘世清,《周书》《北史》有传之吕思礼等,也包括一批北族和外族墓志,对此,王素序已有充分介绍,我愿谈谈我初读后的另外一些体会。

高阳原所在的长安南郊,是韦、杜两族世居之地。本书前言说到考古队曾住地西五桥村,应即杜甫在《何将军山林》中所说之第五桥,类似例子较多,可以知道杜甫天宝后期所住长安城南,当即在杜陵至高阳原一带。杜甫曾引过“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俚语,是说当时的实况。本书收韦家墓志12方,杜家墓志未见,大约仅因开掘之处仍有一定局限。而12方韦氏墓志,恰说明韦家在其地势力之盛。其中韦维一系多达8方,最具代表性。且先列表将世系示意如下(墓志志主姓

陈尚君,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

名后男加▲标识,妻则括注于夫名下):

景略—瓚—叔谐

叔谦—知人—维▲—虚心▲—有邻▲

(妻崔氏▲)

虚舟

(妻李氏▲)

缙

缙—鹏▲

绪

缙

绍

纵—通理▲

虚受▲—粲

季武

此家属于京兆韦氏南皮公房,其间中心人物无疑是官至右庶子的韦维。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六曾载先天元年(712)坊州石刻《韦维善政论》,云“著作郎杨齐哲撰。维,先天中为坊州刺史。齐哲所撰,其实德政碑也,特异其名尔”。此碑后不传。本书五六号《韦维墓志》撰于开元六年(718),为其婿旧相崔日用撰文,载其任坊州刺史是自户部郎中授,在职“剖符作牧,威名自远。淮阳不薄,素高长孺之风;承明未厌,更闻严助之宠”,只是一般叙述,不知当时为何兴师动众地立碑自颂。其子韦虚心夫妇及另一子一孙墓志,则各有特点。韦虚心墓志由崔日用子、李白友人崔宗之撰,其中叙述唐玄宗先天间事,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时大夫窦怀贞蓄缩自贤,遽除好佞,内倚盖主,外交上官,众恶元规之尘,且防息夫之口。公挺然固守,不附回邪,由是为怀贞所忌,及

有弹按,皆以直绳,不能上下其手。又为时宰所恶,乃移公判仓部员外郎,朝廷称屈。”此处有些将两次政变相混。窦在神龙间依附韦后,娶韦后乳母为妻,韦后败,复杀妻自解,为时论所讥。景云、先天间,他依附太平公主,即志所云“盖主”,打击玄宗亲信,韦虚心也被排挤。玄宗讨平太平一党,窦怀贞被杀,其间崔日用出力甚多。此志所述,应在此背景下理解。韦虚心在开元时期历任中外要职,墓志提供的史实极其丰富。其妻崔氏墓志,为虚心亲撰。述崔氏读书一节较可吟讽:“尝读《列女传》,至贞顺节义,不能释手。及至辩通仁智,则曰美矣,然未足多。逮观古典,得其精义,凡所一历,成诵在心。晚年病亟,归信释氏,性相苦空,无不了达。”可作唐妇女读书之人生几部曲来看待。韦虚舟妻李氏墓志,由韦虚心与于休烈合作完成,韦虚舟自书,内容一般,估计兄弟各有所长,遂合作完成。虚心子有邻墓志,不署撰人,但志中自称“吾舅氏之子”,编者附按认为可能也是崔宗之,可从。此外,此一家族群墓志还包括韦维三位侄子,即韦缙子韦鹏、韦纵子韦通理、韦虚受墓志,都有一些特别记录。如云韦鹏开元中后期任新安郡司法参军时,“属海贼作梗,邦人连累,公以渠魁既戮,诖误尽原”。新安郡即歙州,距海甚远,而受诖误连坐者居然引及,事件一定不小,记载可贵。又韦虚受墓志云其天宝末任蜀州刺史,在玄宗西幸时,领蜀郡大都督府长史,对稳定地方,供应行在,立功甚大。肃宗灵武即位后,他则“军输资转输之勤”,但却坐微累贬官,所涉事皆甚大。

此外,所存韦慎名及妻刘约墓志,属韦氏郾公房。韦慎名主要仕历在武后时期,到开元十五年(727)卒,年七十六。刘约墓志云:“自韦府君作

牧外台,十有余载,政刑具举,风化大行,曷惟君子多才,实亦夫人助政。”直云夫人参与了夫君之政务,较为少见。

近代以来,凡划定地域所做科学系统考古,常能将一家族墓志系列出土。高阳原韦氏墓如此丰富,对唐士族研究意义确实很重大。

就艺术史言,本书收殷氏家族三方墓志,即三九号颜颀墓志、四二号殷泰初墓志、四九号殷仲容墓志,提供了唐前期重要书家殷仲容生平和家室的重要记载。殷氏自陈殷不害以下,世工书画,代有美誉。仲容父令名,存世书迹以《益州长史裴镜民碑》著名,赵明诚《金石录》卷二十三以为“笔法精妙,不减欧虞”,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三谓“吾最爱殷令名书《裴镜民碑》,血肉丰泽”,“方润整朗者,当以《裴镜民碑》为第一,是碑笔兼方圆,体极匀整”。高宗、武后间,殷仲容之书尤负盛名,窦泉《述书赋》卷下谓其“奕世工书,尤善书额”,“皆精妙旷古”。存世以昭陵存《马周碑》和《昭陵六骏赞》著名。颜真卿后来之书法,所走正是“笔兼方圆”“血肉丰泽”的路数,且其父颜惟贞、叔颜元孙早年皆于殷仲容家习书,真卿虽未见仲容,但因父早亡,也随母寄居殷家。颜颀为著名学者颜师古之女,十七岁嫁仲容,永隆二年(681)四十七岁时身歿,当时“所生男女,婚嫁已毕”。殷泰初为仲容长子,卒于次年,年二十八。两方墓志没有书撰人落款,但仔细阅读,可以确认二志皆殷仲容撰文,二志书迹也很明显是一人所书,皆仲容自书的可能性很大,后者当然还要比较仲容存世书迹方能确定。若然,则书史意义极其重大。《颜颀墓志》极赞其妇德,也述及其才艺:“好尚文藻,手不释卷,留意管弦,特尽其妙。”“动笔成章,发言为则。镜前

微睇,疑画疑神,阶上徐回,如花如雪。”生动写出世家才女之风神。写自己的悲恸,则云“伉俪卅余年,春秋卅有七,奄忽长逝,何痛如之”。并云夫人“平生所愿,指期松竹”,且自誓“待尽天年,同归泉穴”,是唐亡妻墓志中较早且极其动情的一篇。殷泰初为仲容嗣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也极其悲痛,云:“其父哭之而恸,三号遂止,叹曰:‘死生有命,今古共同,修短在天,贤愚罕避。’”只能“骨肉任归土壤,魂气幸接来因”,寄望身后父子再见,沉痛至此。殷仲容卒于长安三年(703),年七十一,知他仅比颜颀年长二岁,妻亡后始终未娶,最终实现与妻同穴之愿。墓志述其生平甚详,在此不一一叙述。可以注意者,一是他在垂拱元年(685)曾“枉以亲累,左迁隆州长史”,长寿三年(694)又“滥治长之非,左降施州司马”,时皆在武后篡唐之关键时期。二是他的才学与婚姻,仅云:“公才雄著述,及精图写,千载之外,独冠古今。皆成部表,发挥别传。唐秘书大监颜师古,海内羽仪,人物宗蒋,家有淑女,亲结其缡。”评价高到极致,估计因另有别传,未能详写,而他的婚姻由颜师古选定,确是盛事。三是墓志正文长达1044字,由“孤子承业书”,篆盖则旁书“孤子损之书”,二人为当时在世的四子与次子,可以见到其家传书学之延续。

文学史料,试举两例。十五六年前,日本伏见宫发现旧藏《杂钞》卷一四,见《书陵部纪要》五一号刊住吉朋彦《伏见宫旧藏杂钞卷一四》,其中有李南《落花词》一首:“桃李蹊初合,逢春遍吐花。狂风不解惜,吹落万人家。”李南生平无考。因为同卷多中唐前期诗,或亦同时人。本书收长安二年(702)《李南墓志》,李南,字崇懿,陇西成纪人,恒州行唐令思俭(名宝)子。自大帝挽郎,迁幽州

参军,改婺州司仓,卒年四十九,长安二年(702)葬,生卒年约为公元654~702年。与《杂抄》作者未见契合点,是否为一人,还有待审定。本书八五号《王正墓志》,志主为大历十三年(778)归葬,作者署“京兆府乡贡进士李儋撰”,其人应即韦应物名篇《寄李儋元锡》之受诗者。韦应物于大历九年(774)任京兆府功曹,曾摄高陵宰。十三年(778),任郾县令。李儋此时称“京兆府乡贡进士”,即获京兆解得到至礼部冬集的机会。韦应物文集中与李儋来往的诗很多,此一题名可资解读诗意。

墓志所见唐代婚姻史料,特别可以揭出本书八四号韩云卿撰《大唐故乐安郡太君赠贝国太夫人墓志铭》。韩云卿为韩愈叔父,志撰于大历九年(774)。夫人姓任,为安西都护任师利孙女,咸阳丞任义方长女。“既笄,嫔于绛州府君于氏。”“生今京兆尹兼御史中丞颀。”任氏卒于大历九年(774),年六十九,及笄约在开元中期。又云颀“始在襁褓”,任氏则因父亡,“自伤兄弟幼弱,家业将坠,遂誓心入道,捐舍世务,卒归父母之室,以佐弱振孤焉。由是与于氏绝,当时亲戚,无不义之”。于颀,《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六《于颀传》载其父庭谓,仅任济王府仓曹,所谓绛州府君为颀贵后赠官。他大历八年(773)五月自太府卿为京兆尹,建中二年(781)自郑州刺史为河南尹,兴元元年(784)以御史大夫入蕃宣谕,寻再尹京。贞元十五年(799)以太子少师致仕卒,年七十四,即生年在开元十三年(725),算来也就在任氏归于家之一两年。任氏因父死,母家无人主持,乃以入道为名,与颀父断绝夫妻关系,其亲戚无非议,且“莫不义之”,肯定她的行为。颀父乃别娶裴氏,生三子二女,其间经过十余年,颀父与裴氏皆亡故,据说因于颀及其父与裴氏所生子女“均在童孺,藐

然而无所依”,任氏乃“复归于氏,均养诸子”。这里显然隐瞒了许多事实,即颀父与裴氏共同生活了十多年,加上任氏生子、丧父到与颀父分开的几年时间,于颀此时年龄应该已经在二十岁上下了,肯定已非童孺。任氏在颀父已亡,不是复婚的情况下,仅以颀母之身份,复归于氏,其间过程是很值得玩味的,很可能是在于颀以冢子身份主持家政后,复迎归其生母。任氏早年之离开于家,也很可能是被休弃而归。从中可看到唐代家庭婚姻的一些复杂面向。

可校今本《旧唐书》误文者,也举一例。《旧唐书》卷九十八《李元紘传》,载其“本姓丙氏”,因曾祖燦随李渊入关,参与建唐,“赐姓李氏”。本书三三号《李恂墓志》,志主为李燦侄孙,称其曾祖讳明,祖讳纲,叔祖即燦,“以功授上柱国、应国公,拜宗正卿,谥胡公,赐姓李氏”,与史合。《旧唐书》云李燦“年八十余卒,谥曰明”,则燦父名明,不得谥明,知今本“明”为“胡”之形误。

五三号泛义协墓志,为敦煌土著泛家的唐初重要墓志,其中既提到“父伏养,皇初起义,授通义大夫、仪同三司”,可能即以敦煌归唐之功。泛义协虽似主要生活在中原,年八十六卒时仅称“将仕郎”,其实终生未官。其子则为“前灵州鸣沙县令”,仍仕于敦煌,凡此皆颇可玩味。

本书也透露了一些研究院已见而未发表墓志的信息。如八七号《唐宗室妇清河张夫人墓志》附案云,此张夫人父母张浑夫妇墓志,已经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出土,“其曾祖母窦氏是玄宗之姨母,玄宗幼年丧母,为姨母窦氏所鞠养。其外祖母是玄宗第四弟岐王李范,其姑母是肃宗张皇后,其婶母是肃宗女郾国公主”。上述包含的信息太丰富了。玄宗母窦氏,因细故为武后所杀,玄

宗后建骊山长生殿祭祀,寿王妃杨玉环借口为她追福而度为女道士。这里涉及玄宗早年的生活状况,以及与窦氏家族相关而涉及玄宗家人之婚姻状况,都值得深入探讨。

最后,我想稍谈对俚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产生时代的看法。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本《三秦记》据《御览》辑二句。《三秦记》作者辛氏,或云东汉人,或以为不晚于魏晋,此书若收二句,是先唐已有。然今检《太平御览》,并无此二句,不知辑者何据。今按此语之唐代书证,仅见三处,一是杜甫诗《赠韦七赞善》“时论同归尺五天”句自注,作俚语;二是《全唐文补遗》六辑收杨篆撰《韦媛墓志》,三是唐末韩鄂《岁华纪丽》卷二所引。宋人所引,今知有十多例,如邓名世

《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二十四称“至隋唐都京兆,杜氏韦氏皆以衣冠名位显,故当时语”云云,程大昌《雍录》卷七云“语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以其迫近帝都也”,又云“韦曲在明德门外,韦后家在此,盖皇子陂之西也。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者也。杜曲在啓夏门外向西,即少陵原也”。洪迈《容斋随笔》卷三《俗语有所本》即称“唐‘城南去天尺五’之类”,都作唐时事。今人刘庆柱《三秦记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认为“二地因唐代诸韦、杜姓贵族居此而得名”,推断本文非《三秦记》文是恰当的。本书所收大量韦氏家族墓志,更为此增添了有力的证明。

原载于《中国文化研究》辑刊第一集(2018年8月)

出土文献所见丝绸之路概说

荣新江

摘要:丝绸之路研究主要依据三个方面的资料,东西方的传世文献,丝路沿线发现的文书,各地出土的文物。丝绸之路沿线的敦煌、吐鲁番、楼兰、尼雅、焉耆、库车、和田、穆格山等地都发现过不少各种语言文字书写的文书材料,应当收集丝路沿线出土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材料,把其中的零散信息,集中到丝绸之路的历史叙述当中,其中很多内容是传世史料和考古文物所没有的。出土文书在研究丝绸之路上具有以下重要性:第一,出土文献提供了有关丝绸之路交通路线的直接记录;第二,出土文书记录了丝绸之路的实态;第三,出土文书记录了丝绸之路东西传播的商品种类和商贸情形;第四,出土文书展现了丝绸之路上传播的文化。今天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应当发掘丝路沿线出土文书中有价值的残片,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有意无意留存下来的文本,丰富我们对于丝绸之路的认识,谱写更加绚烂多彩的丝绸之路历史。

关键词:丝绸之路;粟特商人;西域佛教

中图分类号:K 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1-0108-07

A Survey on the Silk Road as Seen in the Documents Unearthed along the Silk Road

Rong Xinjiang

Abstract:The study of the Silk Road used to depend on three kinds of materials,i.e.traditional textual documents from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documents discovered along the Silk Road,and cultural relics unearthed in various places. Materials written in different script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were unearthed from such places along the Silk Road as Dunhuang,Turfan (吐鲁番),Loulan,Niya (尼雅),Qarashahr(焉耆),Kuqa(库车),Khotan(和田),and Mount Mug (穆格山).

荣新江,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

Though scattered, these materials provide us with a lot of invaluable information that is not contained in the previously discovered textu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they should be put together and placed in the historical narration of the Silk Road.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unearthed docu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Silk Road from four aspects. Firstly, they provide us with direct records of the traveling routes of the Silk Road. Secondly, they record the truth of the Silk Road. Thirdly, they record the types of transported goods and the situation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along the Silk Road. And fourthly, they exhibit the cultures spread along the Silk Road. Scholars should fully explore the value of the fragments unearthed along the Silk Road when making their studies on the Silk Road. By using these textual documents preserved for us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we will greatly enrich our knowledge about the Silk Road, thus writing a more colorful 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Key words: Silk Road, merchant from Sogdiana(粟特), Buddhism of the Western Regions (西域)

丝绸之路研究主要依据三个方面的资料:东西方的传世文献、丝路沿线发现的文书、各地出土的文物。

丝绸之路沿线的敦煌、吐鲁番、楼兰、尼雅、焉耆、库车、和田、穆格山等地都发现过不少各种语言文字书写的文书材料,前人已经利用其中的资料来研究丝绸之路的某些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尤其以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为集大成之作。但丝绸之路沿线仍然在不断出土新的文书,而国内学人关注不够的西域各种胡语资料中,也有很多是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材料。应当收集丝路沿线出土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材料,把其中的零散信息,集中到丝绸之路的历史叙述当中,其中很多内容是传世史料和考古文物所没有的。

本文拟从四个方面,阐述出土文书在研究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

一、出土文献提供了有关丝绸之路交通路线的直接记录

中古传统的典籍中,如隋代裴矩的《西域图记》、唐朝贾耽的《皇华四达记》等,都比较简要地记录了中国通向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十分可贵。但对于一些道路的细节,则缺少记载。如果我们把出土文献整理一下,则可以勾勒出一段段道路的具体走向,连接在一起,就是一条详细而可以贯通的“丝绸之路”。

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曾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破城子遗址,发掘到一枚王莽时期的《传置道里簿》木牍,上面记录了长安到张掖郡氐池的20个置之间的里程^①;巧合的是,1990年,甘肃

^①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96页。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汉代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到一枚《传置道里簿》木牍,记录了武威郡仓松到敦煌郡渊泉间 12 个置之间的里程;两相结合,正可以复原西汉时期从长安到敦煌的驿道和驿站设置情况^①。根据学者们的仔细考证,我们可以得知这两枚简牍所记汉代驿传道里的详细情形,填补并丰富了我们对于汉代丝绸之路的认识。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出土文献都是极其偶然留存下来的残篇断简,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残简来举一反三地理解历史的真实情境。既然汉代官方文书中有从长安到氐池、苍松到渊泉的《传置道里簿》,那么我们可以推知从长安往西,所有汉代设立了驿站的地方,都应当有类似的“道里簿”,把这些道里簿连缀起来,从长安直到敦煌的道路记载应当是存在的。出玉门关的西域诸国,《汉书·西域传》记载了每个国家东西南北四至所达旁国的里数或马行天数,虽然由于材料来源不同,资料并不完整,也有相互矛盾之处,但大致上可以据此勾勒出整个《西域传》所记范围的道路交通状况,从长安到安息国都番兜城,清晰可见。加之《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可以把汉代丝绸之路一直绘制到大秦国的黎轩。

到了唐朝,我们拥有的出土文书更为丰富。敦煌出土写本《沙州图经》卷三有敦煌县所属“一十九所驿”的条目,详细记录了每个驿站的位置和距东西驿站的里程,其中瓜州和沙州之间的一条道路,摘要如下:“〔沙州〕州城驿,右在州东二百

步,因州为名。东北去清泉驿卅里。清泉驿,去横涧驿廿里。横涧驿,北去白亭驿廿里。白亭驿,东北长亭驿卅里。长亭驿,东去甘草驿廿五里。甘草驿,东南去阶亭驿廿五里。阶亭驿,东去瓜州常乐驿卅里。”^②我们据此可以画出瓜沙二州之间的驿路。同条还记录了从瓜州常乐县界的新井驿,经广显驿、乌山驿、双泉驿、第五驿、冷泉驿、胡桐驿,到伊州柔远县界的赤崖驿^③。这虽然记录的是武周时期瓜州、伊州间驿道的情况,但也就是玄奘贞观初年经过莫贺延碛的那条道路的具体走向。

《沙州图经》卷五石城镇下,还有“六所道路”条,我们举其中两条道路的记载:“一道南路。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里。其路由古阳关向沙州,多缘险隘。泉有八所,皆有草。道险不得夜行。春秋二时雪深,道闭不通。一道从镇西去新城二百卅里。从新城西出,取傍河路,向播仙镇六百一十里。从石城至播仙八百五十里,有水草。从新城西南向蒲桃城二百卅里,中间三处有水草,每所相去七十余里。从蒲桃城西北去播仙镇四百余里,并碛路不通。”这就是从沙州出阳关所走的西域南道东段,中间经过石城镇(即汉代的鄯善国)和播仙镇(汉代且末国),因为唐高宗上元二年后,这两个地区划归沙州管辖,改名为石城、播仙镇,所以以石城镇为中心的道路情况记录在《沙州图经》中,可惜的是播仙镇有关道路的部分残缺,所以不得其详。

同样是敦煌出土的《西州图经》,虽然保留的

^①何双全:《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甲渠候官、悬泉汉简〈传置道里簿〉考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 30 期,1998 年,第 62-69 页。

^②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榎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64-69 页。

^③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榎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第 64-69 页。

片段不长,但有关“道十一达”条的部分却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每条道路都有名字。我们也举两条道路的记载:“大海道。右道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咸苦,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银山道。右道出天山县界,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多沙碛鹵,唯近峰足水草,通车马行。”^①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从沙州,经西州(吐鲁番),越过天山,到焉耆国的道路,连缀起来。而《新唐书·地理志》保存的贾耽《皇华四达记》,记录了西域地区道路的情形。

《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的道路条记载十分珍贵,它们不仅仅告诉我们当时道路的走向和里程,还有车马行走的具体状况,是丝绸之路交通的真实记录。按照唐朝的制度规定,这类图经每个州都要三年一造,也就是每三年要对原本就有的《图经》文本加以修订,补充新的内容。道路条目是每本图经都要有的,所以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唐朝州县的《图经》中,都有类似的道路记载,把这些记载连缀起来,就是一个详细的“道里簿”。《西州图经》出土于沙州,表明这类图经也会为临近或毗邻的州县抄写留存,以供交通往来之用。

所以说,虽然目前我们在传世文献中没有特别详细的、完整的有关丝绸之路道里的记载,其实在唐朝,这种交通道路的记录不仅有,而且非常详细。

在出土为胡语文书中,也有类似的地理文献。吐鲁番发现的粟特语国名表(Nafn ā mak),如编号 T II D 94 文书中,提到一连串的地名,按顺序可以对应于汉文的拂菻、苦国、波斯、安国、吐火罗、石国、粟特、拔汗那、竭盘陀、佉沙、于阗、龟兹、焉耆、高昌、萨毗、吐蕃、吐浑、弭药、薄骨律^②。大体上是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向东记录重要的城镇,有的学者认为是表示摩尼教团位置所在,还有的认为是粟特商人的经商路线。

民国时任教于北京大学的钢和(A. von Staël-Holstein, 1877—1937)曾获得一卷敦煌写本,用藏文、于阗文写成,其中于阗语部分的第 10 至 17 行,记有从于阗经沙州到朔方一路的地名,第 17 至 24 行记有西州回鹘王国所辖范围内的城镇名,有些简要注记城中情况^③。根据于阗语部分的发愿文,该卷年代大概在公元 925 年。这些地名可能是于阗国使者经行该地时所做的记录,是五代时期有关丝绸之路西域南北道路的较为详细的资料,可以和高居海《使于阗记》或王延德《使高昌记》相媲美。

此外,敦煌发现的于阗语文书中,还有一篇往迦湿弥罗国的行纪(编号 Ch.i.0021a,b),共 35 行,记某人自于阗经疏勒(今喀什),往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的行程。文中提到当时在位的迦湿弥罗国王是 Abhimanyugupta (958—972 年在

①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1 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4—55 页。

②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氏著:《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1 页。

③F.W.Thomas & S.Konow, “Two Medieval Documents from Tun-huang”, Oslo Ethnografiske Museums, Skrifter, vol.3, Hefte 3, 1929, pp.1—40; H.W.Bailey, “The Stael-Holstein Miscellany”, AM, n.s., II.1, 1951, pp.1—45; J. 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TP, XLVI, 1958, pp. 115—153; 黄盛璋:《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上、下),《敦煌学辑刊》1986 年第 2 期,第 1—18 页;1987 年第 1 期,第 1—13 页。

位),知为 10 世纪后半叶的行纪,十分珍贵^①。

从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官私文书可以得知,这类有关丝绸之路交通道里的记录,未曾断绝,而且有些是常规性的地方官府记录,并制度性地上报中央,有些为国史记录下来,有的则湮没无闻。今日治丝绸之路的人总是觉得史籍中没有关于丝绸之路的详细记载,其实不然。

二、出土文书记录了丝绸之路的实态

丝绸之路是一条东西交往的通道,历史上许多使者、僧侣、商人、士兵、文人都曾在这条路上行走,让丝路变成一条活跃的道路。传世史料中保存有不少中外使者往来的记载,如《史记·大宛列传》所记张骞西行事迹;也有不少僧人求法的传记,如《法显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这些无疑是有关丝绸之路的重要文献。但和丝路上曾经往来的人物相比,留下来著作者要少之又少。出土文书为我们今天了解丝绸之路上的行旅,探索丝绸之路的实态,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也补充了一些内容。

在 1997 年考古发掘的吐鲁番洋海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阚氏高昌王国(公元 460—488)永康九年(474)、十年(475)出人出马护送外来使者的记录^②。这些使者有来自印度西北部斯瓦特(Swat)地区的乌苾使,有自当时南亚次大陆上的笈多王国的婆罗门使,有来自西域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一

个小国——子合国的使者,有来自塔里木盆地北沿大国焉耆的国王一行,还有来自中原南方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的刘宋王廷的吴客,以及来自阚氏高昌的宗主国——漠北柔然汗国的使者。这些经过高昌的使者主要去往两个方向:一是北山,应当就是指吐鲁番盆地北面的天山,越过天山,向东北前往柔然的汗廷。一是焉耆,即位于吐鲁番西南边的绿洲王国,从这里可以去往西域、中亚、南亚等国^③。如果我们把这件送使文书所涉及的高昌、柔然、焉耆、子合、刘宋、乌苾、婆罗门等国标识在一张地图上,就可以获得公元 5 世纪下半丝绸之路东、西、南、北各国交往的历史景象。此时正是北方强国嚙哒击败萨珊波斯,占领了巴克特里(Bactria)的奇多罗(Kidāra)领地,并进而占领了索格底亚纳(Sogdiana),还把势力伸进塔里木盆地,从这件送使文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中亚、南亚的国家纷纷奔赴柔然汗廷的身影,他们应当是向柔然借兵以抵抗嚙哒,所以虽然战乱频仍,但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往来更加频繁活跃。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书中写到,由于中亚或中国西北地区动乱,部族劫掠,所以丝绸之路断绝往来。事实上,这种说法未必正确,兵荒马乱的年代,或许更是需要各国使者往来穿梭,密切沟通的时期。

新获吐鲁番文书中有《唐天宝十载(751)交河郡客使文卷》,记载了天宝十载从七月下旬到十月初来到西州交河郡客馆居住的官人、使者,

① H.W.Bailey, 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 (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 Part 2: Inscriptions of the Seleucid and Parthian Periods and of Eastern Iran and Central Asia. Vol. 5: Saka). London 1968, p. 70 - 73; 黄盛璋:《敦煌写卷于阚文〈克什米尔行程〉历史地理研究》,《新疆文物》1994 年第 4 期,第 27-48 页。

②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62-163 页。

③ 参看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历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4-14 页。

有的来自西边的安西四镇地区,有的从北边来自北庭,有的从东面的伊吾、长安而来。从丝绸之路和中亚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使者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宁远国的使者,即来自中亚锡尔河中游的费而干纳(Ferghāna)盆地,他们在天宝十载八月前后,至少分为八个般次前往唐朝都城。其中记有三位宁远国王子,一位叫“屋磨”,应当就是《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条所记的宁远国王子:“(天宝八载)八月,宁远国王子屋磨来朝。”这些有关客使的记录,丰富了史籍的记载^①,也提供了盛唐时期丝绸之路的畅通情况。

敦煌发现的写本文献中,也有一些僧人行纪,包括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其中最重要的是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这位开元中期经过西域地区回到唐朝的新罗僧人,不仅记录了他本人在丝绸之路上的行程,而且对于丝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宗教情形有清晰的记载,提供了开元盛世时期丝绸之路的实际情况。

敦煌文书中还有许多汉文、藏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的书信,也都真实地记录了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各色人物的情形。

三、出土文书记录了丝绸之路东西传播的商品种类和商贸情形

从公元4世纪初叶写成的粟特文古信札,到10世纪的敦煌吐鲁番文书,记录着丝绸之路上一批又一批的商人活动的情况,包括他们贩卖的

商品,以及交易的记录。

大概年代在公元313年前后的粟特文古信札,记录了以姑臧(武威)为大本营的一个粟特商团的商贸活动情况。他们的活动范围东到洛阳、邺城,西到撒马尔干,长途或短途贩卖,把西方的贵金属、香料、药材运到中国,再把中国的丝绸运到西方。

出土文书中有许多契约,记录了丝路商人交易的真实形态,我们举几个例子。1997年,吐鲁番洋海出土的《阚氏高昌永康十二年(477)张祖买奴券》,记当地官人张祖用行继137匹,从康国来的粟特商人康阿丑那里,买下名为“益富”的胡奴^②。此外,吐鲁番早期出土的《北凉承平八年(450)翟绍远买婢券》^③,卖主石阿奴很可能就是来自中亚粟特石国的粟特人。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还发现过粟特文的买卖奴婢契约。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天宝某年王修智卖胡奴契》(敦煌研究院收藏),也是买卖胡奴时所订立的契约。画家张大千在20世纪40年代在敦煌得到一件《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沽》的文书,登录着“蕃奴”“蕃婢”,与马匹一起标价出售,这是因为在唐朝的市场上,人口和牲口同等对待,都在市场中专门经营这两种商品的“口马行”来进行交易,这件文书就是沙州市场官员把口马行的外来奴婢和马匹的价格上报给上级官府的记录。

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的人口贩子,他们把中亚粟特地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地区的男女奴隶,

^①参看毕波:《恒逻斯之战和天威健儿赴碎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5-31页;又《吐鲁番新出唐天宝十载交河郡客使文书研究》,《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79页。

^②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5页。

^③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92-93页。

倒卖到高昌、敦煌,以及中原一些地区。这些被倒卖的男女奴隶多被命名为中国人熟悉的吉祥、褒义、好听的名字,如“益富”“绿珠”“绿叶”等,是非常中国化的名字。粟特商人把倒卖的奴婢起这样好听的名字,目的显然是为了兜售他们的商品。

记录粟特商人贩卖的商品的典型史料,是吐鲁番出土的麹氏高昌国时期的《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①,买卖的商品有金、银、丝、香料、郁金香、砾沙、铜、石、药材、石蜜,除了粟特商人向西贩运的丝之外,大多数是西方的舶来品^②。而且贸易的双方基本都是粟特人,也就是说,从西方来的粟特商人把大宗货物运载到高昌,由高昌的粟特商人买下来,再分散或整批运至河西或中原地区兴贩。

至于贸易的形态,我们也可以从吐鲁番文书中得到很多印证。我们知道,粟特人经过长时间的经营,在撒马尔干和长安之间,甚至远到中国东北边境地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在这个贸易网络的交汇点上,建立起殖民聚落,作为他们东西贸易的中转站。吐鲁番文书《唐垂拱元年(685)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记录了两组从粟特、吐火罗来的商人在西州重组商队,准

备从西州到长安去经商^③。另一件吐鲁番文书《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则记录了一些居住在长安的粟特人,他们与汉商一起,西到弓月城及更西地区经商贩易的情况^④。

粟特商人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一般来讲,他们是要组成较大的商队来一道行动,特别是经过像塔什库尔干山区或翻越达坂的时候,更是要成群结队,以防强盗劫掠。但是,到了唐朝在显庆三年(658)灭西突厥汗国、控制整个西域中亚地区以后,开通道路,列置馆驿,行旅要较以前安全,粟特商队可以不必再组成大的商队,所以我们在吐鲁番文书中看到的一些个人的行旅情形,如吐鲁番出土的《唐开元二十年(732)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文书,记载了粟特商人石染典带着作人康禄山、石怒忿以及家生奴移多地,还有牲口等,从安西(今库车)先到瓜州市易,准备再到安西经商。文书显示,石染典一行经过悬泉守捉、常乐守捉、苦水守捉、盐池戍守捉等地方上的镇防机构,由官员勘查后,来到沙州。石染典向沙州官府呈报自己携带奴隶、

①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450-453页。

②参看朱雷:《麹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期,1982年,第17-24页。

③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350页。参看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6-258页。

④《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242-247页。参看黄惠贤:《〈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释》,唐长孺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44-363页;荒川正晴:《唐帝国と粟特人の交易活動》,《東洋史研究》第56卷第3号,1997年,第185-188页;又“The Transit Permit System of the Tang Empire and the Passage of Merchants”, The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59, 2002, pp.7-18; 又《唐代粟特商人与汉族商人》,荣新江等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1-109页。

牲口到沙州贩易,并申请去伊州的过所。文书上有沙州市令张休勤同的字样,确认石染典所带人员和牲口数目属实。这是一件难得的文书,是粟特商人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最好的证据。

四、出土文书展现了丝绸之路上传播的文化
在丝绸之路经过的敦煌、居延(黑城)、吐鲁番、楼兰、库车、和田等地,都出土了大量的属于典籍文献类的材料,是我们考察丝路上各种文化传播的最直接的材料依据,这些材料可以和传世文献保留的正史、僧传、地理书相互补充,但出土文献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丝路文化的认识。

佛教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文化,它从印度传入中国离不开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历史上不论是印度高僧的东来还是中国僧侣西行求法,都离不开丝路上绿洲王国的支持,出土文献对于我们认识丝路王国的佛教文化传播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初的佛教并非从释迦牟尼传法的印度本土传入西域和中原内地,而是主要从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地区传入的,这一点从出土文献上来看是十分清楚的。目前新疆出土的最早的佛教文献并不是用印度本土的梵语所写,而是用犍陀罗地区流行的犍陀罗语写成的,这就是和田出土的犍陀罗语《法句经》^①。中原地区虽然没有保存下来最

早的佛教典籍,但洛阳早期佛教寺院的井栏题记,也是用犍陀罗语书写的^②。加上现存佛典中的音译词汇,可以确证早期进入西域和中原的佛教文献,都是用犍陀罗语所写。而从这些佛典以及早期梵文写本来看,最早传入西域和中原的佛教教派,也是出自西北印度的法藏部^③。

在丝路南道的和田地区,稍晚于犍陀罗语的出土文献材料,主要是梵文的大乘经典,如《妙法莲华经》《大般若婆罗蜜多经》《大般涅槃经》等,以后还有用当地的于阗语翻译的大乘经典。这是和传世的中文史料记载相一致的,即古代于阗王国是西域大乘佛教的中心,也是中原大乘佛教的重要输送地,不论朱世行的西行于阗求取《般若经》,还是实叉难陀东来传译八十《华严》,都表明于阗对中原佛教的重要意义,而出土文献部分展现了于阗佛教的真面貌,特别是于阗僧人阅读什么经典,讲说什么佛教教义。

与和田相对的丝路北道据史德(巴楚)、龟兹(库车)、焉耆、高昌(吐鲁番)等地,则主要流行小乘佛教,出土了大量说一切有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梵文佛典和戒律文献^④。由于中原主要流行大乘佛教,西行求法的中原僧人也多是大乘教徒,如玄奘,对小乘高僧带有蔑视的态度,所以中原佛教文献对于西域北道佛教水准的记录并不

① J.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② 林梅村: 洛阳所出佉卢文井栏题记——兼论东汉洛阳的僧团与佛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14辑,1989年。

③ F. Bernhard, "Gāndhārī and the Buddhist Mission in Central Asia", *Anjali, Papers on Indology and Buddhism*, O.H.de A. Wijesekera. Felicitation Volume, J. Tilakasiri, ed. Peradeniya 1970, pp. 55-62.

④ L. Sander, "The Earlies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and the Sarvāstivāda Mission", *Corolla Iranica: Papers in Honour of Prof. Dr. David Neil MacKenzie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on April 8th, 1991*, ed. Ronald E. Emmerick & Dieter Weber, Frankfurt u. a. 1991, pp. 133-150.

准确,甚至有误导。通过出土的大量梵文、龟兹语、焉耆语的文献残卷,我们对西域北道小乘佛教的教学和严格的戒律制度,都有了相当详细的了解,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留存在北道沿线的佛教石窟雕像和壁画的内涵,因为有不少壁画的内容是根据当地流行的佛典绘制上去的,我们从中原的典籍中有时难以找到对应的文本。

在吐鲁番、龟兹、和田出土的汉文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唐朝时期从中原西传的汉译佛典。这些典籍大多数属于大乘佛教,是以书籍的形式传播或传抄到西域地区,是佛教在中原地区立足、生根之后倒传西域的现象。658年唐朝灭西突厥汗国,唐朝制度文化开始大量进入西域地区,汉化系统的佛教寺院也随之在安西四镇地区建立^①,在这些以龙兴寺、大云寺、开元寺为代表的汉化佛寺当中,也保存了大量的汉文佛典^②。

不论是龟兹语、焉耆语还是汉语佛典,都成为10世纪后半叶立国于吐鲁番的高昌回鹘王国的佛教思想和文本来源。但高昌回鹘在丝绸之路史上最值得夸耀的,应当是当时流行的摩尼教和东方基督教。在高昌城、吐峪沟、柏孜克里克石窟等地,发现了大量用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粟特文、

回鹘文所写的摩尼教文献,有经典,也有仪式性文本,还有摩尼教教团运营的文书^③,表明摩尼教在9—10世纪时,曾经在高昌回鹘盛行一时。而葡萄沟内一座基督教的寺院遗址里,更是发掘到一个图书馆,有大量用叙利亚文、中古波斯文、粟特文、回鹘文所写的东方基督教会的典籍和文书^④。

这些文书表明,高昌回鹘摩尼教和景教都与它们的西方教团有一定的联系,但其中详细的信息还有待深入探讨。

在丝绸之路沿线,不论是悬泉、尼雅、楼兰、居延,还是敦煌、吐鲁番、焉耆、龟兹、巴楚、于阗,出土了各种语言的典籍类文献,其文本本身和内容所记的宗教信仰、思想文化,都是我们研究沿丝路传播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素材,而这类文献残片还在不断发现,充实着丝绸之路的文化史。

总而言之,今天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在我们的前辈充分利用传世典籍的基础上,更应当关注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各类文书材料,发掘其中有价值的残片,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有意无意留存下来的文本,丰富我们对于丝绸之路的认识,谱写更加绚烂多彩的丝绸之路历史。

(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①荣新江:《唐代西域的汉化佛寺系统》,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文化研究》第1辑,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6月,第130—137页。

②荣新江:《唐代龟兹地区流传的汉文典籍——以德藏“吐鲁番收集品”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编:《国学学刊》2010年第4期,第77—83页;又《唐代禅宗的西域流传》,《田中良昭博士古稀纪念论集·禅学研究的诸相》,东京:大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8页。

③M. Boyce, A Catalogue of the Iranian Manuscripts in Manichaean Script in the German Turfan Collection, (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Institut für Orientforschung. Veröffentlichung Nr. 45.)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60; 森安孝夫:《5εdλ/ε=Cā 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1、32合并号,1991年。

④E. C. D. Hunter & M. Dickens, Syriac manuscripts in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 (VOHD), Stuttgart.

究人冥天之际^①

李 浩

我愿意领衔承担《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馆藏志》整理工作,并将阶段性的部分成果率先公布,不是蓄谋,纯属偶然。我本不擅金石学,从没有在此领域开疆拓土的雄心抱负。之所以耗费近五、六年的时间精力,倾力于片石把玩,誊录校读,既是因为某种机缘,也是为了一份友情。

老友齐志嗜收藏,很多年前,我曾以张钊筑千唐志斋藏贞石、吕建中修大唐西市广收散石以成博物馆的样板激励他,一而可再,继之则可鼎立而三。老友古拙真朴,欣欣然有向往之意。唯因财务及时局,他遇到许多困难,委实不易。我促成他与榆阳区政府合作,使得这批贞石没有飘零流失,而是全部集中存放在新落成的博物馆中,既让这批文物安家落户,又纾解了老友的焦虑。博物馆甫成,解铃还需系铃人。受老友与博物馆的委托,由我领衔,组建团队,做馆藏石刻文献的录文整理。

当然,说我完全不关注石刻文献也不属实。早年读书,曾修过戴南海先生的古籍整理课程,也听过王利器、李学勤、胡戟等先生的专门讲座,唐代文学研究圈中傅璇琮、陶敏、韩理洲、陈尚君、胡可先等先生关注新文献,每有新成果我能第一时间分享,唐史研究领域中胡戟、荣新江、葛

承雍、朱玉麒等先生对新文献的敏感,对新材料的利用,也给人以深刻印象。我自己的硕士论文本来还包括《孟浩然诗集校注》,当时已完成初稿,答辩完成后即束之高阁。后来的博士论文与博士后出站报告,也特别留意利用包括墓志在内的新文献。我关于李白研究写过一篇沾沾自喜的文章《范碑所述李白世系的谱牒学问题》,实际也是读碑志所获感受,当然这些碑文、墓志早出,已经成为传世文献的一部分。后来胡戟先生、荣新江先生主持大唐西市藏志的整理工作,邀我参加,并让我忝列编委,惭愧的是我未能有任何实际贡献。

犹忆十年前,齐志兄偶然将其新收藏墓志的拓片赠我,怂恿我写点文章,我一再以琐务繁忙为由拖延。2015年后我因个人原因辞去管理工作,齐志又用此话头激我。自忖虽然不做行政管理,但仍然在岗执教,教学科研都是份内之事,理应为供职单位有新的奉献。即便在教师的岗位上尸位素餐,也会为人诟病。加之苦海无边,不为无益之事,又何以遣有涯之生呢?

—

启功先生《论书绝句》其十:“书楼片石万千题,物论悠悠总未齐。照眼残编来陇右,九原何

^①本文为作者所著《摩石录》代前言,未定稿,借此第一次发表,希望广泛地征求意见,以便打磨完善,最后定稿。

处起覃溪。”^①以清代不断出现的金石文物更新书学界有关碑学帖学的论争,来说明新材料新文献的重要性。

《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所收录整理的是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的馆藏墓志,这个博物馆由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建立,展陈的藏志主要由齐志提供,也包括榆阳区文保部门过去征集和收藏的部分文物。

从数量上说,委托我们整理的墓志总数是166方。从时间上说,这些墓志从西魏一直到明代。其中西魏北周2方,隋代10方,唐代146方,宋代1方,金代1方,明代7方。从空间上说,这些墓志主要是关中地区和陕北地区的。其中朔方郡夏州统万城附近的18方,其余绝大部分是关中地区的。

从内容上说,涉及宗教类的5方,涉及异民族和外族的有4方。从亲缘关系来说,涉及父子关系的2方,涉及夫妻关系的8方。其中不少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如北周的拓跋慎墓志、隋代的梁修芝墓志、唐代的李百药墓志、高崇文、高承恭父子墓志等等。还有反映民族关系、丝路交往的吐谷浑成月公主墓志、回纥会宁郡王移建勿墓志;反映书法艺术的《唐故遂州司马常府君墓志》盖铭,李阳冰撰额。特别是双语的《大唐故安优婆姨塔铭》,难得一见,为镇馆之宝,我在后面还要论及。

王昶《金石萃编自序》中说:“宋欧、赵以来,

为金石之学者众矣。非独字画之工,使人临摹把玩而不厌也。迹其囊括包举,靡所不备。凡经史、小学,暨于山经、地志、丛书、别集,皆当参稽会萃,核其异同,而审其详略,自非轻材末学能与于此。且其文亦多琅伟怪丽,人世所罕见,前代选家所未备。是以博学君子,咸贵重之。”对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新藏志,亦当作如是观。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②陈寅恪此文写于二十世纪前半叶,故特标举敦煌学,饶宗颐《法国远东学院藏唐宋墓志拓本图录引言》一文中则说:“向来谈文献学者,辄举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为新出史料之渊藪。余谓宜增入碑志为五大类。碑志之文,多与史传相表里,阐幽表微,补阙正误,前贤论之详矣。”^③榆阳区博物馆藏志为文献宝库的第五大类史料即“碑志之文”又增加了新的藏品。

通过对这些第五大类文献进行录文整理,可以为中古隋唐历史、社会、文学、艺术包括丝路文化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新材料、新个案,拓展文史研究的空间,因为新出文献中仅仅人物传记部分就“数倍于两《唐书》纪传人物的传记资料”^④。藉

①《启功论述绝句百首》其十。

②《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③饶宗颐主编《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第3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

④胡戟著《〈珍稀墓志百品〉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整理《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穿越漫长幽深的时间和空间，触摸有温度的历史细节，考察重要事件的发生现场，聚焦古人对死亡的情礼百态，调整因史料缺乏而板滞的宏大叙事，细化并深化有更多高清像素的历史图景，我和我的团队为有这样的历史际遇而庆幸，也愿意竭诚努力，不辱使命。

二

收入本集的主要是馆藏文物取样的部分成果，具体可分为两组：一组主要针对士人知识分子的墓志，另外一组则针对古代少数民族及入华外族人的墓志、塔铭，属于当代所谓中西交通、西域学或丝绸之路研究。各篇讨论的主要问题及初步结论如下：

1.《新发现唐李百药墓志铭及其价值》

新发现唐初史学家、诗人李百药墓志铭，对墓志铭进行了录文和初步整理，根据墓志及史传资料，对赵郡李氏汉中房支进行重新阐释，通过丧葬地的变化观察汉中房支迁徙的细节。利用此志对李百药的生卒年及年龄重新订正，同时重新简评李百药的文学创作。

2.《唐代士族转型的新案例：以赵郡李氏汉中房支三方墓志铭为重点的阐释》

孤立起来看，《李百药墓志铭》提供了初唐社会文化政治的不少碎片信息；但若将其与李百药祖父母的墓志（《李敬族墓志铭》、《赵氏（兰姿）墓志铭》）联系起来对读，信息量就更大；新出隋唐文物文献甚伙，如能做进一步梳理，并能结合传世文献，不仅作史料比勘，而且能做细致的史学分析，其意义将会逐渐显示出来，新文献的价值也会逐渐为人们所认知。

陈寅恪以赵郡李氏西祖房即李德裕祖孙丧

葬地及祖茔所在分析山东高门大姓的变与不变，本文重点讨论李氏汉中房之丧葬地的改变。表面上看，似有模仿之嫌。但若注意到陈氏所选个案在中唐时代，与“唐宋变革论”的宏大叙事合。本文所举案例在隋末唐初时期，似乎与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史叙述模式没有关联，这又是同中之异。

作者在本文拈出“转型”一语的微意，就是试图在已有的叙述话语系统和错综复杂的新史料之间建立某种关联性。众所周知，“唐宋变革论”是以中唐作为社会变迁的开端，而在笔者看来，这个起点似可上推，笔者所选的这个案例以及毛汉光的系列研究已经证明，以丧葬地的改变来表征家族活动中心的变化，并不始于中唐，甚至也不始于初唐，在西魏北周或更早就已出现，这样“中央化”或转型的开始也随之可以朝前推，只不过这种变化并不是暴风骤雨，而是潜转暗换，而且还有数量上的多或少、规模上的大或小、性质上的显或隐的区别。

对士族转型或整个中古社会转型有重大影响的一系列变迁在初唐时期已露端倪：一是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即中古社会的城市化趋势。二是从南向北的迁徙流动。永嘉之乱，晋室渡江，大姓世族亦随之南迁，南朝自恃为正朔所在。隋末唐初以来，士人为了仕进，又由南返北，并将丧葬地及家族活动的中心迁到了长安、洛阳一带。三是从桑梓故里向政治文化中心的转变，即毛汉光所谓“中央化”趋势。四是由经学世家向文史政事家族的转变。五是由文史家族向文学词臣家族（即陈寅恪所谓“进士词科阶层”）的转变，这一点均与李德林、李百药家族有关。六是由察举制向科举制的转变。此一转变与前列各点多有交叉重

迭,出现于隋,制度化于初盛唐,对唐代乃至整个前现代的中国都发生重大影响,也是士族转型及中古社会转型的重要推手。

3.《新见唐褚遂良撰书贞石整理研究》

新发现褚遂良撰文并书写的《随故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长安县开国公薛府君妻故冯夫人墓志铭》(简称“《冯五娘墓志铭》”),据志文知,冯夫人五娘无论是其夫家还是其娘家,都是累世显贵。特别是其子薛万均、薛万彻、薛万备,对于李唐王朝建基贡献卓著,薛万均在唐太宗心目中地位极高,令其难以忘怀,故其母冯五娘病逝,由当朝知名文臣和书家撰文并书志,应该是顺理成章的。由墓主人冯五娘的卒葬事件,可以考知本志撰写于贞观十二年二月廿六日至五月十三日之间,书碑也应在这段时间,其时褚遂良在起居郎任上。

考褚遂良书法创作,本志应该是存世的褚遂良碑志类作品中最早的一篇,体现的是他前期的文风和书风。本志的出土应能引起书法界和文史学界的浓厚兴趣和热烈讨论。笔者在本文仅仅是发布新材料,不具体介入褚遂良书艺的深入讨论。

4.《新见祖孝孙墓志铭释读》

新见《祖孝孙墓志铭》对隋末唐初音律学家祖孝孙的任职迁转有较详细的记载。《旧唐书》本传等传世史料没有记载祖孝孙的生年及寿数,但《墓志铭》有详细的记载,据卒年贞观五年(631年),享年七十,来逆推其生年应该是北齐太宁二年(562年)。墓志铭对祖孝孙在隋末唐初音律所作独特贡献也有详细叙述,与传世文献对读,可以深化并细化现有的研究。

5.《新见唐代李白姻亲宗氏夫人墓志考略》

陕西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有唐代宗氏夫人墓志一盒,包括墓盖和墓志两部分。其中墓盖长39厘米,宽39厘米,高5厘米。墓志长41.5厘米,宽41.5厘米,高10厘米。墓盖用篆体,题为《唐故夫人宗氏墓志铭》。墓志题为《故主爵郎中彭州刺史李倓妻南阳郡君宗氏墓志铭》(以下简称《宗氏墓志铭》)。据志文知,墓主人是宗楚客的二女儿,与唐代诗人李白有姻亲关系。本志对宗氏世系的叙述可以补新、旧《唐书》的不足与错讹,对深化李白生活与创作也有裨益。

6.《新发现唐代刻石名家邵建和墓志整理研究》

新发现的《邵建和墓志铭》对于我们了解唐代石刻艺术家邵建和及其家族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可以细化并深化对唐代刻工及石刻艺术家群体的了解。新出史料与传世文献互相印证,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初步结论:

首先,墓主邵建和的卒年及年龄有确切的记录,可以补史之不足。其次,对墓主的卒葬地的记录清晰准确。第三,对邵建和家族和醴泉邵氏世系有一个简明的勾勒。第四,对唐代石刻艺术名家的简要罗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初唐到中晚唐石刻刻工的简单谱系。但有趣的是,对初唐以来的刻石名家多所提及,唯对同时代的天水强氏家族则不着一字。第五,唐代是中古家族史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世胄阀阅类家族逐渐式微,但寒庶技艺类家族的社会地位有了长足的发展。以石刻刻工行业而言,邵建和墓志铭述及的邵建和、邵建初兄弟,以及子侄辈的邵宗昇等,此外还有天水强氏家族的强琼、强琮、强演、强审、强颖等,均可以成为支撑此观点的一个有力证据。

7.《新见唐代吐谷浑公主墓志的初步整理研究》

本文对新见吐谷浑慕容氏成月公主的墓志进行了录文和初步整理,并就这一新出文献与弘化公主墓志、法澄塔铭对读,对与此相关的吐谷浑研究、唐代贵族女性修佛、长安寺庙研究等进行推展,并得出如下初步的结论:一,成月公主当系吐谷浑诺曷钵与弘化公主所生,为其次女,生于贞观二十年(646年),卒于总章元年(668年),享年23岁。幼时即入唐代长安的兴圣尼寺修习,卒于寺内,葬于明堂县(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少陵原。二,诺曷钵至少有五子二女,而一般的研究者仅提及其有三子。又,传世文献对弘化公主下嫁诺曷钵的时间与出土的《弘化公主墓志》不同,笔者以为,应以墓志为准,至少交代分歧,两说并存。三,成月公主所修习的兴圣寺是一个尼寺,但与一般的尼寺似有较大区别,其地理位置在长安外郭城通义坊,距皇城、宫城较近,在政治上与统治阶级高层关系密切,高祖舍宅,太宗立寺,玄宗巡幸并任寺主,在教义上当属华严宗,故寺内有寺主法澄绘制的《华严海藏变》。而法澄圆寂后所葬的马头空,应是将其葬于马头空的窟室内,也就是中古时期僧人常采用的石室瘞窟法。

8.《新出唐代粟特人双语塔铭汉文部分释读》

一,新出《大唐故安优婆姨塔铭并序》用双语书写,考虑到新见双语墓志的数量有限,故其对深化方兴未艾的入华粟特人研究乃至丝绸之路研究,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因本塔铭是征集而来,已经无法复原文物出土地点,且有相当程度的风化磨损,故文物与其遗址的许多信息都无考。学术研究中能推进

处是将此方塔铭与已经出土的其他新文献及传世文献进行对照比勘,另外也期待通过汉文部分与外族文字部分互相比释读来抉发新意。

三,仅据塔铭能辨认的的汉文内容,仍能提供很多新史料,此安姓优婆姨当是昭武九姓的安国人,即今所谓粟特人,但其先世已迁居凉州姑臧。她在长安的私第在外郭城西的群贤坊,其地毗邻西市,有不少外族人集中居住。她没有像其他粟特人一样崇信祆教,而是信奉在当时与后世多视为佛教异端的三阶教。她的葬法也有些异乎寻常。卒后并没有祔夫葬或与家族合葬,而是采用林葬起塔,与其他僧俗信众一起,陪葬在三阶教创始人信行塔的旁边。

四,考虑到本塔铭的粟特文部分尚未翻译释读,汉文部分也有不少残损缺漏,故本文的初步研究只不过是新文献的发布而已,期待学界更多人的关注。更深入的成果,还有待同行的共同努力。

9.《西安新见两方回纥贵族墓志的初步考察》

本文对新见的两方回纥贵族墓志进行录文整理,并结合已出文物和相关传世文献,做一点初步的考察和解释。作者首先对两方墓志铭进行对读,分别就相关联的丧葬时间、丧葬地点、两个墓主的关系、两方墓志的作者等问题进行讨论。然后将这两方墓志与已出其他回纥人墓志比较,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相关的问题上:一是“回纥”与“回鹘”名称问题,二是几位旅居长安回纥人的寿数,三是回纥人在长安的葬地,四是旅居长安回纥人的丧葬资费,五是旅居长安回纥人在长安的居所,六是旅居长安回纥人的身份,七是几方墓志提及唐与回纥贵族的婚姻,八是回纥人墓志的文体特征和写作风格等。

这两方新出回纥贵族墓志的内容极丰富,与此前出土的三方墓志的关系也极密切,但不少问题颇复杂,需要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笔者较早看到这组新文献,希望能引起相关领域专家的关注,作出更专精更深入的成果,用新史料和新文献推进回纥(鹞)史的研究。

王国维总结宋代金石学研究的经验:“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其成绩实不容蔑视也。”^①本集对部分墓志的初步整理秉承并发挥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往复互证”的原则,同时采用新文物之间“比较互见”的方法。目前所做的工作,仅仅是馆藏文物中部分藏品的初步整理和释读,犹如地质勘探中试钻的岩石取样,野外采集中的标本展示,不能代表全部。但管窥蠡测,也可以让大家对整个藏品多一份向往。因为学科所限,本人目前所做的并不是系统全面的专门研究,只不过是学术新信息的阶段性发布和公布。坦率地说,我看重的并不是个人的具体结论,而是实时将博物馆和收藏家秘藏的新文物,搬运到文史学界,奇物共赏,疑义相析。嚶其鸣矣,求其友声,希望能引起更多同道的关注。

三

关于碑刻文献研究的历史,清人陈彝曾说:“从知华屋即山丘,桂翠兰香影不留。毕竟古人能好事,摩挲片石已千秋。”^②其实古人研究金石不止于千年,应该说有了金石,就有金石的研究。

早在六朝,梁元帝就曾撰《碑集》一百卷^③,应该是碑刻著录研究的开始。

但习惯上认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金石学成立于宋代。王国维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金石之学,创自宋代,不及百年,已达完成之域。……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故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可也。”^④赵明诚是宋代金石学的代表人物,他在《〈金石录〉序》中说:“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之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疑。”

清代应该是金石学的第二个高峰。康有为从书法的帖学与碑学的转型来论述:“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干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父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发其光采,摹拓以广其流传。若平津孙氏,侯官林氏,偃师武氏,青浦王氏,皆缉成巨帙,遍布海内。其余为《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图》《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续编》《金石补

①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遗书》。

②桂邦杰纂、钱祥保修:《江都县续志》卷15《金石考》,《隋张通妻陶贵墓志》跋引清陈彝诗,民国二十六年据十五年刻板重印本。

③梁元帝《金楼子》卷五《著书篇》。

④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遗书》。

编》等书,殆难悉数。故今南北诸碑,多嘉道以后新出土者,即吾今所见碑,亦多《金石萃编》所未见者。出土之日,多可证矣。出碑既多,考证亦盛,于是碑学蔚为大国。适乘帖微,入纆大统,亦其宜也。”^①康氏虽然是从书学的视野看金石学,但也能看出当时金石学的兴盛了。他的全书通论书道、书史和书艺,但仅目录就专列了尊碑第二、购碑第三、碑品第十七、碑评第十八等四个专题讨论,也可见其对碑学的重视程度了。

钱大昕在为毕沅《关中金石记》作序时说:“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盖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抄板刻,辗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②又称:“古人之叹古籍传写久而讹,唯吉金乐石流传人间,虽千百年之后,犹能辨其点画而审其异同,金石之寿实大有助于经史焉。”

二十世纪以来,西学东渐,欧风美雨鼓荡,潮流所及,学风亦为之丕变。河南安阳新出之甲骨,陕西周原新见之钟鼎,特别是陇海铁路的修建,使沿线地下文物被挖掘,张钫先生收集民间散落的碑志,安置于洛阳龙门,遂有千唐志斋的藏石。1949年之后,新旧政权鼎变,文教事业亦旧貌换新颜,但因五六十年代的农田水利建设、八十年代的城镇化建设,特别是方兴未艾的“铁(路)公(路)机(场)”建设,使得包括墓志在内的地下文

物密集出土,这是国家基础建设的副产品,但也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材料。

因为新材料的“井喷式”出现,传统的金石学在现代非但没有衰落,反倒又有一次新的复兴,这是实现学术本土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但因为数量巨大,内容繁多,整理研究成果频见于报纸、杂志和各种专书中。以我熟悉的师友而言,胡戟先生注重新文物的收集保护,陈尚君先生注重新材料与传世文献的互证,胡可先先生注重新材料与文学的关联性,荣新江先生注重新材料与域外文化的关联性,周伟洲先生注重新材料与境内民族的关系,李健超先生注重新文献中的历史地理信息,葛承雍先生注重新材料中的艺术史元素,程章灿先生注重新文献与金石学义例研究,吴敏霞注重地域性新文献的搜集整理……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开具,我不熟悉的专家的研究视野与面相更多,这里不一一罗列。^③

关于碑刻的分类及其作用,程章灿先生将石刻文献分为七种类型,第一种:墓碑,或者说碑刻。第二种:墓志。第三种:石经。第四种:题名、题刻。第五种:摩崖。第六种:刻帖。第七种:杂刻。石刻文献有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石刻实物本身,第二种形态是拓本,第三种形态则是录文。他还认为,石刻研究有三个层次(或者说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层次:史料学研究。即把石刻当作一

^①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疏证·尊碑第二》,中华书局(香港),1979年出版。

^②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三《〈关中金石记〉叙》。

^③仅由中国文物研究所策划的《新中国出土墓志》就有煌煌19巨册,由文物出版社从1994年开始陆续推出,到2009年也仅出了河北、河南、陕西、江苏、重庆、上海、天津等部分省市的出土墓志。另外,由毛汉光主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共十八册,作为史语所专刊推出,也是一项历时既久、颇见功力的世纪工程。其他专题研究、专项研究的成果更多,此处不一一罗列。

种史料,当作一种文献。第二个层次:史学研究。是在史料学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第三个层次:文化研究。^①

古人讲的金石,今人讲的石刻都是较大的概念,自有其理路,我们这里不作评议。如果我们将其中的志幽文字单独抽出来,也就是常说的碑记、墓表、墓志、塔铭之类,单独从考古学、金石学或文献学任何一个学科来规范限定,都未免过于狭窄。通过对墓志的考察整理,我认为有必要正面思考和关注古人对冥界的布置与经营,古人将他们在人间取得的文明成果用于对自己或祖先在冥界安息之所的营构,同时竭力凿通对天界的想象和梦想,从广谱的交叉科学角度来进行挖掘和研究,至少涉及到以下五个领域及其相关学科:

一是生命伦理学。唐代墓志的生命理念从阴阳两隔到生死仙三界的打通,墓志设立从权贵专享到全民普配,墓志文体从整饬呆板到自由多样,二百多年有很多变化。但也有一直不变的,这就是对生命的各种咏叹和对亡灵世界的多样悬想、猜测、幻视。如果说,对墓主人去世前的治疗、陪护是属于临终关怀的话,那么,在去世后的卒葬环节的礼仪、每年岁时节令的祭奠缅怀,就

应该是终后关怀。南宋范成大《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家山随处可行楸,荷锄携壶似醉刘。纵有千年铁门坎,终须一个土馒头。三轮世界犹灰劫,四大形骸强首丘。蝼蚁乌鸢何厚薄,临风拊掌菊花秋。”^②由行经生圻引出对死亡的宗教哲学思考,这种思考的材料既源于《庄子·杂篇·列御寇》中的感慨^③,也有对唐代王梵志打油诗的胎息。^④

二是遗址景观学。墓地与陵寝首先涉及到选址,其次涉及到营造,主要与堪輿学相关,但地面矗立或隆起的堆土及建筑,地下空间的开拓,冥物摆放与分布等等,涉及到景观学、建筑学、仪式学,既丰富也复杂。巫鸿认为,当我们单独讨论墓葬中出土的玉器、青铜器、画像砖石等等时,它们作为一个墓葬的整体性意义便也弥散掉了。他从空间性、物质性、时间性三个比较观念性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墓葬艺术从史前一直到宋辽金这漫长时段中的历史变迁,也具体呈现了他尝试建立的一套系统的处理和理解考古材料的理论方法,从而生动地向我们展示出中国古人对于“生”与“死”这一人生基本问题的看法和实践。^⑤

三是丧葬人类学。丧时与葬时,丧地与葬地,权厝之地与永葬之地,在古代即涉及到制度的规

①程章灿《石刻研究的基本问题》,《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第7期,又见微信公众号《程门问学》。

②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二八,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1981年

③《庄子·杂篇·列御寇》:“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征征,其征也不征。明者唯为之使,神者征之。夫明之不胜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见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夫!”

④王梵志诗《城外土馒头》:“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又《世无百年人》:“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⑤巫鸿《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出版。

定,又与礼俗习惯相关。

《通典》中具体记录了墓志石在葬礼过程的顺序:“陈器用:启之夕,发引前五刻,搥一鼓为一严。陈布吉凶仪仗,方相、志石、大棺车及明器以下,陈于柩车之前。”“器行序:彻遣奠,灵车动,从者如常,鼓吹振作而行。先灵车,后次方相车,次志石车,次大棺车,次輶车,次明器輿,次下帐輿,次米輿,次酒脯醢輿。”^①

四是图绘现象学。碑刻上的图案、纹饰、字体、字号、色彩,壁画及其他明器上的相关图绘^②,还有独具特色的书法,以及由此形成的书法流派。仅就唐墓壁画题材而言,王仁波分为仪仗、社会生活、狩猎、生产、建筑、星象、四神等七类。^③李星明则分为两类:一是表现贵族宅邸(或官苑)的现实性图像系统,另一是表现宇宙时空的宇宙图像和表示升仙、吉祥或厌胜的神瑞图像所构成的图像系统。^④康有为从书法学的角度谈之所以尊唐碑的五大理由:“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划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

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⑤近年来在西安及其周边新出的包括粟特人在内的外族人墓志、塔铭,已经引起艺术史界的浓厚兴趣,也产生了不少有意义的成果。

五是碑刻文献学。有人又称作石刻文献学,但后者概念应该更宽。这方面大家谈得很多了,成果也很丰盛,故这里从略。

从这样宏阔广域的视野看墓志或石刻文献乃至传统的金石学,我们已经做的工作及其开拓,真是太少了,太狭隘了。张怀瓘《书议》:“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深意,以见其志,览之即令了然。若与面会,则有智昏菽麦,混白黑于胸襟;若心悟精微,图古今于掌握。玄妙之意,出于物类之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间。岂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测。非有独闻之听,独见之明,不可议无声之音、无形之相。”^⑥

墓志碑碣的研究虽是小道,但它涉及到古人对冥界立体多元的规划设计和营造制作,既有观念层面的,又有技术层面和材料层面的,还有艺文美术层面的,与现代广域的宗教学、人文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材料科学息息相关,关涉“古今学术史之通义”的“大事因缘”^⑦。对于有

①《通典》卷第一百三十九《礼》九十九《开元礼纂类》三十四《凶礼》六。

②林圣智《中国中古时期的墓葬空间与与图像》,收入颜娟英主编《中国史新论(美术考古分册)》,联经出版公司,2010年出版。

③王仁波《隋唐时期的墓室壁画》,收入《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2《墓室壁画》,第21-34页,新华书店1989年。

④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第128-136页。

⑤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疏证·尊碑第二》,中华书局(香港),1979年出版。

⑥《法书要录》卷四。

⑦这两个概念分别见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志于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者而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四

启功先生评述包世臣的《艺舟双楫》时说道:“横扫千军笔一支,艺舟双楫妙文辞。无钱口数他家宝,得失安吴果自知。”^①启先生肯定了包世臣的书论而挖苦其书艺,以启先生的资历与成就,当然有资格臧否前人。

藐予后学,艺能既无,学识又谫陋,自知属于“轻材末学”。之所以对此项目念兹在兹,不避愚钝,实因机缘凑巧,地不爱宝,天降斯任。虽拖延再三,然终未能弃。金启琮先生曾说:“余所以孜孜为此,颇有心为未来学者斩棘披荆,而无意与当代方家争光竞耀。盖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为愧,我致

力处亦不必因人之不屑为羞,盖学术与一时风尚不必尽同也。”^②金先生的话虽朴实,然暗合中外学术发展之规律,置于当下学界,不啻洪钟巨响,能否警醒世人,不敢妄言,但实慰我心。

前文已经反复致意,因阴阳两隔,幽明不同,逝者已歿,令其长眠安卧,是生者的责任和义务。此即《葬经》所谓:“葬者,藏也,乘生气也。”但沧海桑田,陵谷巨变。天不吝宝,人欲汹涌。我们这一代虽然能比干嘉诸老看到更多的本应秘藏冥界的志幽文字,究竟是幸焉,抑或不幸焉?^③我不能言。但既然已经出土,我们有责任尽量收集保护,并略作粗浅解说,以便最大程度上减轻我们的愧疚与罪愆。我个人及本书所能做的,也仅仅如此而已。

①《启功论述绝句百首》其二十。

②《清代蒙古史札记》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③罗新《新出墓志与现代学术伦理》(见《南方周末》2008 年 3 月 6 日第 24 版)也谈及此点,并且上升到学术伦理的高度来讨论,可惜罗文是我最近才从网上读到。我自己在 2013 年大唐西市石刻文献学术研讨会议的发言中也意识到此点,文收入拙著《课比天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出版。

西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简介



西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前身是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成立于1992年,是承担留学生招生、教学培养、日常管理、后勤服务和对外汉语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工作的学校内设二级单位。2014年成立中亚学院,与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合署办公。2017年,实施“留学西大”工程,以提高国际学生培养质量为核心,打造特色项目和教育品牌为着力点。2018年11月,学校实行大部制改革,将原国际处与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合并,成立了国际合作部(国际教育学院)。

国际合作部(国际教育学院)下设部(学院)办公室、国际项目管理办公室、出国管理办公室、合作办学办公室、国际学生招生办公室、国际学生管理办公室、汉语文化部、专业项目部、国际学生后勤服务中心、海外留学服务中心等部门。现有专职对外汉语教师15人,管理干部20人、外聘及后勤服务人员24人。

西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着重培养国际学生的全球视野、独立思考能力、创新思维能力、跨文

化交流能力、专业技术能力和知华、友华、爱华情怀。截止2019年,已培养超过60个国家的12000余名国际学生。目前,国际学生规模与质量呈逐年上升趋势,2019年共有1449名留学生来校学习,分布在全校22个院(系)30多个专业,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的学历生占在校国际学生比例75%以上。学院积极协助和支持全校多个院系和专业开设全英文授课项目,目前已覆盖国际贸易本科专业、国际法硕士专业和多个博士专业项目。

近年来,依托西北大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相关学科方面的深厚积淀和高水平教学科研团队,结合古城西安在历史文化方面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学院与世界一流汉学家、国内外学术名家和多个学术机构开展合作,加强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研究,建立了对外汉语教学与中国文化体验实验教学中心,将“智慧课堂”和云平台引入教学,努力打造立体化中国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平台,培养中华文化交流使者,促进中外文明互鉴。

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针对来华留学生,开设“特色文化体验系列”精品选修课,帮助国际学生学习了解中医、茶艺、戏曲、太极拳等传统文化;打造“汉唐文化专题特色体验营”,使留学生通过参观汉唐文化遗址、体验传统民俗活动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特点。举办国际学生校园文化节和陕西省国际学生文化节、“感知中国:新西行漫



记”和“丝路秦商”等品牌文化活动,培育高校多元文化氛围,促进中外学生文化交流。

举办国际论坛、学术会议和中华文化研修项目等,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开展中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2017年举办“向先贤看齐,做交流使者”国际学生主题论坛,2018年举办中外文化名家对话,2019年举办“中华人文精神”国际学术研讨会,聚焦文化传播模式的研究和思想交流。举办中亚国家东干教师培训项目、中华文化传播远程教育项目、承办孔子学院总部法国汉语教师培训班和教育部国际司“一带一路”国家中华文化高级研修班等,吸引海外汉语教师和青年汉学家来校交流,积极培养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骨干力量。

走出国门,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开展



多种形式的文化传播。与企业合作,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西北大学中亚学院分院,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千人培训计划”;与国外教育机构合作,派遣教师团队赴泰国开办语言文化夏令营;派出留学生演出团队,赴俄罗斯宣传陕西特色文化。

架设桥梁,助力中外民间社会与大众文化交流。开办美国、意大利等大、中学生中国寄宿家庭学习项目,促进海外青少年与普通中国家庭双向语言学习和中西文化交流;组织“留学生教育扶贫活动”,以国际学生赴乡村中小学支教的形式,帮助国际学生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帮助农村青少年学习外语、了解世界,促进一带一路国家“民心相通”。

多年来,学院先后培养了一大批知华、友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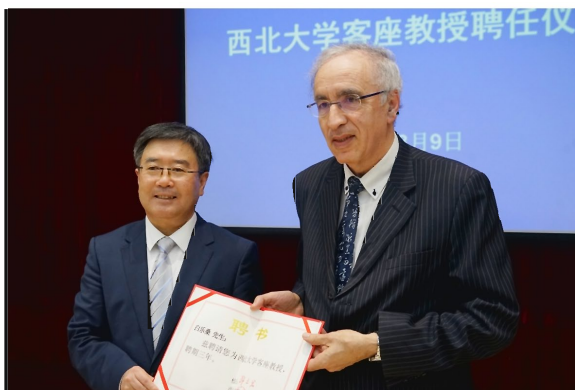


爱华的国际学生，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其中包括美国、泰国驻中国使领馆官员、韩国翻译家等。近年来，一批正在成长的学术新秀、创业人才和艺术明星，特别是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如乌兹别克斯坦学生苏河和星星，俄罗斯学生李优、土耳其学生白振国等，多次被中央电视台等各级各类传媒采访报道。

2009年，学校被国家教育部授予“来华留学生教育先进集体”称号；2017年，顺利通过国家教育部“来华留学质量认证”。2018年，获批设立

孔院总部汉考国际汉语水平 HSK 考点。

2017年，由国务院批准，陕西省教育厅发起成立，西北大学主导，省内高校全员参与，创建了国际汉唐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与国际汉唐学院未来将继续秉持“开放、交流、传承、互鉴”原则，以培养优秀中华文化交流使者为目标，依托陕西省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走进来”；发挥陕西自贸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共享文化资源，拓宽传播渠道，打造“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新高地。



语言学专家——赵小刚



赵小刚,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教学与研究。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文字学会理事、陕西省语言学会副会长等职,主持或完成国家、省、部委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多项,在《中国语文》《语言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在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出版《甘青宁三省区农村汉语言文字应用问题的调查与研究》《说文解字与古代文化》《汉字学论略》等学术专著。

赵小刚教授的学术研究主要涉及汉字学、上古汉语跟非汉语接触、西北地区农村汉语言文字应用等领域。

一、汉字学研究

在研究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之后,赵

教授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说文解字》细致入微地储存了上古时代文化信息。如果把《说文》中的汉字看作一个系统,就会发现一组组汉字有机关联,相互补足,呈现出鲜活生动的历史文化图景。如把“包、炮、煇、庖”等字的形音义综合分析,即可考得食物加工从野外烧烤渐渐进至厨房烹制的过程;把“季、年、晨、秋、春、历”等字放在一起,就会发现年时、季节概念由耕作、收获环节而起,从而深刻理解古代以农为本的道理。二是历代汉字形体均携带着一定的文化内容。汉字从古至今,虽然书体经过了多次演化,但其根本特点——表意性并未彻底改变,自甲骨文、金文至当代汉字,始终如此。依据《说文解字》分析汉字形义关系的范式,可以观照各代文字与文化的关系。

赵教授的汉字理论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字用引发文字职能的调整。汉字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具体字符的形义关系游离,汉字系统便利用形声字形符表义的弹性特点,调整文字职能,达到形义关系的重新统一。二是“六书”构字,交替而行;“六书”序列,指事为首。创造汉字是各种方法交替使用的动态过程,但从记事方法演进的历史、考古成果展现的事实、语言催生文字的过程、人的书画能力发展实际、汉字构形动态演变进程等层面观察,指事是造字第一法,然后才有象形等方式。三是字义与词义相辅相成。在汉语背景下,字义与词义各有特点,但其组织系统互足,呈现方式互备,存在状态互补,从而维护着汉

语言文字系统的和谐稳定,保持着汉语言文字的活力。

二、语言接触研究

赵教授主张,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是一个各具特点的系统,同时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天然开放性。从社会发展来看,人口流动、民族迁徙、人群交往都必然导致语言接触。中国自古多民族交融,先秦——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两汉——汉人、西域诸族、氐、羌、匈奴;魏晋南北朝——华族、匈奴、鲜卑、氐、羯、羌;唐宋——汉人、吐蕃、吐谷浑、党项、回纥;元明清——汉人、蒙古、吐蕃、高昌、契丹、女真、满。汉族跟非汉族交往引起了语言接触,随之,一些非汉语词语进入汉语。如人们熟悉的“祝融”“丰隆”“胭脂”“石榴”“佛”“琵琶”“苹果”“哥哥”“戈壁”等词,都是汉语跟当时少数民族语言接触后吸收的外来语成分。现代语言接触问题广为学界重视,如英语跟汉语接触,汉语跟少数民族语言接触,方言跟普通话接触等。而古代语言接触问题往往被忽视,原因是非汉语成分进入汉语以后,汉字一视同仁地加以记录,使用既久,其非汉语色彩消失殆尽,词语的来源和意义不被一般人所知。古代训诂家受当时语言学观念的制约,多从汉语内部或汉字层面寻求解释,难以正确揭示词语意义。赵教授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借助相关学科的成果,通过民族史、种姓沿革、考古材料、语言资料的综合分析,重新解释了古籍中的一系列词语,如《尚书》《荀子》中的“卢”系列词、《诗经》中的“来牟”、《史记》《汉书》中的“朝那”等等。

三、通用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

赵教授在研究语言文字学理论的同时,还关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农村的应用问题。他调查并分析了西北地区农村居民应用汉语言文字的观念、动机、应用状况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等问题。分析表明,西北地区农村居民中了解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人数比例极低;大部分人不愿意学习更不愿意讲说普通话;不少适龄儿童小学未曾毕业就弃学打工或经营小本生意,家长只要求孩子会写名字会简单运算;不少贫困家庭的成员均为文盲,世代放牧或耕作,没有应用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

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诸如加强对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法规的宣传,设法让人们认识到语言能力低下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实际出发,将政策法规宣传与农村广大群众学习和应用普通话、规范汉字的目的联系起来;既抓学校教育,又抓各类人员培训,处理好民族语言文字、汉语方言和通用语言文字之间的关系;应当按照不同省区居民使用语言的整体差别,分层次推广通用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管理部门应当根据群众的基础语言、民族、性别、身份、年龄、文化程度差异,分批分阶段进行引导和培训;各省区语委、民政部门、教育部门联合动员当地学校教师和学生,帮助广大群众学习和使用通用语言文字。这些建议为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新时期的通用语言文字规划和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赵教授既注重理论探讨,又关切应用研究。在传承语言文字文化的同时,投身于语言文字应用实际,为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进行着积极探索。

新书推介

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教授所著《唐诗求是》一书 2018 年 7 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唐诗求是》是陈尚君先生治学以来精心编撰的论文集,从横的方面,可以看出作者的研究构想与学术格局。如作者所说,全书可以分为四个板块:《全唐诗》、专人、专书、叙录。可用五个字评价:辑、辨、叙、评、论。辑就是在竭泽而渔的基础上辑录最佳文本;辨就是识书籍版本之优劣、知文本出处之真伪、考诗人本事之流衍;评就是对重要著作的书评;叙就是以叙录、提要的形式引导初学者掌握有唐一代基本典籍;论就是在文献考证的

基础上“向上一路”,考察文学与历史文化的关系。从纵的方面看,自 1979 年到 2017 年,共收录 59 篇文章。其中,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收 21 篇,2000 年到 2010 年收 12 篇,2010 年到 2014 年收 26 篇。纵横交错,经纬分明,可以看出作者学术兴趣的转换与拓展,学术生命的绵延与自我更新。既有以往的文献考证,又有新近的人物论述。全书是不同时段的论文合集,真可谓“活”的唐诗研究史了。在《唐诗求是》中,绵密的文献考证固然重要,但文学传叙式的研究思维更应值得关注。(参考徐贺安《学术史中的〈唐诗求是〉》,《中华读书报》,2019 年 10 月 30 日 17 版)

